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工作作风建设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收官之际,共有6484名“走读干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这是中央首次大规模集中处理这一长期顽疾的干部作风问题。

“走读干部”一般指家住城里,不深入群众,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是常常往家跑的基层干部,多为县乡两级干部,家住县城以上的城市,本人在县城或者乡镇工作,要么晚出早归,要么周一去单位上班、周五回家过周末。对于这种现象,社会上的议论多是批评性的,认为这些干部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官僚主义,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

相对于公款吃喝等奢靡之风,“走读干部”问题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也就没有引起部分基层干部的足够重视。但古语有云,“祸患常积于忽微”,“走读”看似小事,实则让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群众中流传着“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的顺口溜,用戏谑的语气透露出对基层党员干部懒散工作作风的无奈和不满。

本期推出“走读干部”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新盼引起您的兴趣。

本期专题·走读干部

- 02 “走读”的干部请你留下来
- 03 6000多名“走读干部”是怎样炼成的
- 04 走读干部的成因与危害
- 06 治理干部“走读”切不可“一刀切”
- 07 治理干部“走读”问题关键在“心”

政坛经纬

- 08 习近平讲话98次提到“严”字 要求防止四大危险

国是论衡

- 09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件套”
- 11 新常态下如何为央行“松绑”

八面来风

- 13 中国关押贪官的“豪华监狱”人为为患

天下大势

- 14 大数据的十大发展方向

人物长廊

- 16 林彪的“怪异”
- 17 揭秘林彪的婚姻与爱情

历史深处

- 20 古代对官员的“民主评议”

悦读时光

- 封三 蒋介石:独夫民贼,还是抗日英雄

——杨天石:毛泽东1936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二)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走读”的干部 请你留下来

干部“走读”的表象之下，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走心”问题，是尸位素餐、庸政懒政的表现。领导干部要增强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自觉性，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就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扎根当地，将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与民同吃苦、共患难的时间久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自然就靠在一起。

治理“走读”问题，首先要靠制度的刚性管住党员干部的心，让那些心不在焉的干部走不了、走不好。这需要我们的提拔、任用干部制度向那些能沉下心、真正踏实为百姓办事的干部倾斜，完善领导干部的评价机制，让群众参与进来，让“走读”的干部走不了；另外，切实推进公车改革，规范财

务报销制度，让“走读”的干部走不好。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干部“走读”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地域回避制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整饬吏治，说到底还是完善对人的管理，既如此，我们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时候也要讲究“以人为本”。近日，陕西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地安家的意见》中就要求，政府做出计划安排，统一解决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周转房建设，保证安家居住用房；组织部门帮助协调安家困难，妥善安排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新工作地工作和就学。为党员干部解决了后顾之忧，让党员干部在工作地有了家的温暖，无疑是让领导干部不愿“走读”的一剂良药。

（新华网 唐华）

6000 多名“走读干部” 是怎样炼成的

“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这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是群众对基层干部“走读”现象的生动描述。干部“走读”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但其比例之高、数目之大还是少见。然而，如此浩荡的“走读”大军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从历史成因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产生“走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四种：其一是“便利效应”。目前，绝大多数乡村都有通往乡镇和县城的石子公路甚至柏油公路，这无疑为农村干部的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创造了客观条件。其二是“水土不服”。目前选调生、公务员队伍大多是学历较高的大学毕业生，曾在高校所在地的城市生活，不少人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不安心长期扎根基层，而是将基层当作跳板，因此他们往往成为“走读”的主力军。其三是“意识淡化”。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化，是“走读”现象滋生的主观原因。有些党员干部感到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该为自己和家庭想了。于是，不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四是“管理缺位”。县级党政组织对乡镇领导干部管理的弱化和为基层服务不到位，导致“走读”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制度约束，是“走读”问题滋长的组织原因。

“干部走读”的行为，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官僚主义，造成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6000 多名“走读”大军的形成，走没了干部耐心，走丢了干部热心，走低了干部能力，走坏了干部形象，严

重损害了干部本人和党委政府公信力。治理干部“走读”走读现象是需要决心和勇气的，要敢于“亮剑”，打好组合拳，从健全机制着手，多管齐下，健全机制，堵住漏洞，从根本上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

治理“干部走读”问题，防止“6000 多名大军”扩大，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狠抓落实。要制定规范干部作息时间的制度，加强督促落实，切忌“令行禁止”的现象。对于任何的违反行为都要坚决地查处，绝不姑息和纵容，杜绝各种人情干扰因素。同时，政策制定应更具合理化、科学化和人性化，改善乡镇工作人员生活条件，努力创造条件让干部“住读”。另外，要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制度，对于党员干部政绩评价和晋升要赋予老百姓更大的权力，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让每个人肩上都担子、有责任、有危机感，从顶层设计上推动地方干部深入群众，从源头上解决“干部走读”问题。

(江苏网)



走读干部的成因与危害

◇ 出现原因:

干部“走读”问题主要在乡镇地区比较突出,城市地区则较少。从历史成因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产生“走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四种:

1、便利效应

现今绝大多数乡村都有通往乡镇和县城的石子公路甚至柏油公路,这无疑为农村干部的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创造了客观条件。

2、水土不服

选调生、公务员队伍大多是学历较高的大学毕业生,曾在高校所在地的城市生活,不少人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不安心长期扎根基层,而是将基层当作跳板,因此他们往往成为“走读”的主力军。

3、意识淡化

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淡化,是“走读”现象滋生的主观原因。有些党员干部感到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该为自己和家庭想想了。于是,不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4、管理缺位

县级党政组织对乡镇领导干部管理的弱化和为基层服务不到位,导致“走读”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制度约束,是“走读”问题滋长的组织原因。

◇ 相关危害: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走读”看似小事,其核心则是能否保持党群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执政基础。任由干部“走读之风”泛滥,会产生诸多问题。

1、履职敷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徐行表示,一些乡镇干部只有在领导点名时见见面、点名后不露面,层层搞“遥控指挥”,既不能及时履行职

责,对群众诉求和基层实际也难以把握,无形中老百姓竖起一堵墙。河南一位农民说,在我们眼里,有些干部就是高高在上的“大老爷”,我们不熟,也不愿意跟他们说啥。

2、滋生腐败

干部“走读”造成许多潜在的腐败现象。一些干部频繁往返用公车接送,增加财政负担,滋生“车轮上的腐败”,助长了特权思想。一位县城干部说,县里数十位“走读干部”,仅每年花在车辆汽油和保养方面的费用就有近20万元。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原党委书记、镇长崔连海,因腐败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经查,崔连海是典型的“走读干部”,办案人员计算,在262天时间里,崔连海的车报销汽油票150张,金额合计7.269万元,算上节假日,平均每天“花费”汽油费约278元。

3、遇事迟缓

海南省一位干部说,“走读”的干部,在“德能勤绩廉”考察中,“勤”这一项一般都存在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当本地出现群体性事件、灾难险情、重大事故等突发性事件时,“走读”给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留下隐患。媒体就曾报道,一次洪水猛袭某镇,当县委书记赶到现场时,该镇党政一把手还迟迟未从县城家返回。

4、专项整治

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收官之际,共有6484名“走读干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其中,黑龙江省共排查出“走读”的乡镇干部4726人,已整改2350人。四川查处1746人,湖北查处1180人,河南查处513人,青海查处190人,江苏查处162人,广东查处136人,浙江查处84人,海南查处60人。北京、上海、甘肃、云南等地在“成绩单”中没有提及“走读干部”的问题。这意味着反

“四风”不仅剑指吃喝奢靡等“明疾”，还深入到党员干部工作态度、考核考勤等“庸懒散奢贪”的“暗症”。

干部“走读”问题主要在乡镇地区比较突出，城市地区则较少。所以，那些拥有广大农村的省份，相对来说查出的数量就较多。同时，由于查处力度和执行标准不同，有一些地方干部“走读”问题也很突出，却在查处方面并没有充分体现。

“基层干部应该在乡镇工作，两脚应该踩在泥土上，这样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走读干部”心不在岗，脱离群众，作风漂浮，只是把工作地当成一间办公室，不要说对基层发展有什么贡献，还会滋生一系列“四风”问题。

◇ 社会评论：

专家：让“走读”“走不了、不好走”还需完善制度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党政领导干部负有管理服务一方、守土有责的职责。党的干部应该和群众在一起，否则就别走当干部这条路。在汪玉凯等专家看来，这些年，对走读干部的管理还缺乏系统性规定。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靠制度，将“走读干部”治理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比如，切实在干部考核上加以倾斜，让那些深入地方、根系群众的干部受尊重、受重用，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要完善现行公车管理制度、财经制度和报销制度，让“走读”“走不了、不好走”，还要完善群众批评和投诉渠道，严格问责制度，让“走神”的干部“走不远”。同时，辛鸣等也提醒，干部也有享受家庭温暖的权利，因此对整治干部“走读”现象，政策制定应更具合理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在人情和原则之间、为民服务和对家庭负责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治理“干部走读”问题，防止“6000多名大军”扩大，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狠抓落实。要制定规范干部作息时间的制度，加强督促落实，切忌“令行禁止”的作风。对于任何的违反行为都要坚决地查处，绝不姑息和纵容，杜绝各种人情干扰因素。同时，政策制定应更具合理化、科学化和人性化，改善乡镇工作人员生活条件，努力创造条件让干部“住读”。另外，要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制度，对于党员干部政绩评价和晋升要赋予老

百姓更大的权力，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让每个人肩上都担子、有责任、有危机感，从顶层设计上推动地方干部深入群众，从源头上解决“干部走读”问题。

像治理“裸官”那样治理“走读干部”

在过去，一些基层干部习惯在哪里任职，就在哪里安家。而当下的一些干部却时尚了，喜欢赶潮流了，已习惯把家安放在县或市里，于是，“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这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是群众对基层干部“走读”现象的生动描述。而这无形中，在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堵墙。

诚然，多年来，一些地方在治理“走读干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湖南郴州采取的是视频点名的方法，让干部不敢缺席；湖北襄阳市则采取明察暗访，让干部不敢“走读”；江西则建设了“廉政”食堂但皆治标不治本，无法将“走读干部”治理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以至于“走读干部”工作在当下，而“生活在别处”。“点名才露面，常常往家跑”，全国一次查处6484名“走读干部”，足见“庸懒散奢贪”的“暗症”，已到了不根治不足以消弭基层百姓愤懑的地步。

但如何根治“走读干部”现象呢？窃认为，不妨来个釜底抽薪；即像当下治理“裸官”那样治理“走读干部”，比如可规定，凡属于“走读干部”性质的，在提拔时，一律不安排担任基层单位“一把手”；已担任“一把手”的，要进行调岗换位。如此做的好处在于：既然你不想安心做基层干部，不想为基层干实事，那对不起，请腾岗让位，走还不送，让那些想为基层百姓干事、乐于扎根基层、与百姓打成一片的干部履职。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好基层干部“走不了”的现象。至于个别干部到基层任职，目的只是想“镀金升迁”，或者贪权恋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百姓要这样的干部作甚呢？！

当然，基层干部也有权享受天伦之乐，在现实中，我们也不能渴求他们只工作，而不要家庭，不给大家以温暖。为了解决二者矛盾，作为地方组织部门，应当在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和居住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尽量做到“举家任职”。如此，才能让基层干部对家庭少点牵肠挂肚，而是安心于基层工作。

（三峡晚报忠铭记）

治理干部“走读”切不可“一刀切”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对乡镇干部“走读”现象十分关注，要求基层部门大力整顿干部“走读”现象。众多乡镇“一把手”及一般干部不爱住乡镇，而把家安在县城。有些人上班晚来，下班早走，做群众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成了名符其实的“走读”干部。治理干部“走读”现象的初衷，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降低行政成本、预防腐败，推动社会发展，强化干部作风建设。

作风虚浮，心不在焉，是谓“走读”之实。“走读”实质上关乎干部作风，核心是能否保持干群及党群的血肉联系，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走读”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干部有意为之，干部调动、到基层锻炼、夫妻

不在一地工作等等都可能造成“走读”。并非所有的“走读”都是“问题”，并非所有的“走读”干部都是“问题干部”。之所以造成人民对待“走读”的反感，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些干部的群众观没有树立好，思想认识的“总开关”出了问题，干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治理干部“走读”现象，需理性看待，不宜“一刀切”。一些地方为了落实文件，不实地调研就大张旗鼓的整治“走读”现象，没做好相关的辅助工作，强制规定工作日全部工作人员必须在单位居住，造成了工作人员怨声载道。一些干部“走读”有其特殊原因，有的是一家老小住在一起，每天回家照顾家庭；有的为了孩子有个好的读书环境，把家安在了城里；有的干部是从城里的政府机关下派来的，如果不让他们经常回家，难免“人在乡镇心在城”，这不仅不切实际，也不利于家庭和睦，甚至会影响工作。治理干部“走读”不能一竿子打死，有的地方甚至在乡镇居住的干部也不能回家，这不仅不利于干部的工作效率，更是让个人怨声载道、叫苦不迭，服务群众欠了功夫。

加强作风建设，树立为民思想，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合理谋划，刹住干部“走读”之风。看待“走读”问题须摘掉有色眼镜，一些“走读干部”兢兢业业、乐于奉献，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治理“走读”不能矫枉过正，重在加强干部自身的作风建设，“走读”不“走心”，心存为民、爱民思想，通过制度约束，刹住“走读”不良之风。

（河北共产党员网 赵明）

治理干部“走读”问题 关键在“心”

日前,成都市纪委监委、市预防腐败局副局长李彬做客“廉洁成都”在线访谈,就“深化作风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干部‘走读’问题专项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李彬介绍,专项治理开展以来成效明显,全市有12000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包括县乡领导干部“住”了下来。纪委和组织部门将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对规定执行不好的将进行批评和点名通报。

“干部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干部“走读”不仅走坏了形象、走散了作风、走失了民心,而且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成都市不出半年两次出台文件治理“走读”,正是基于此问题久已有之、渐成顽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不当“走读干部”,不搞“远程指挥”。笔者认为,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狠刹“干部走读”之风势在必行,治理干部“走读”问题关键在心。静心思考,让干部的心沉下来。与“走读”相对应的是“住读”。住下来做什么,是党员干部思想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住下来什么事都不做,在寝室里看电视睡大觉、无所事事,还不如不住。必须让干部的心沉下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升。沉下来,就要让干部端正态度,深刻认识“走读”的负面影响和巨大危害,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改变的主动性、自觉性,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安心扎根基层,脚踏实地工作。沉下来,就要让干部利用工作之机认真学习,抽出空闲潜心钻研,在实践中丰富知识、提升技能,在思考中增强谋划工作、推动工作的本领。沉下来,就要让干部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和请销假制度,认真执行领导带班、值班等制度,坚持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合力防止“走读”的延续和反弹。

真心服务,让干部的心留下来。“走读”干部把大量的宝贵时间、精力花在了“私”字上,用在了家里、耗在了路上,谋发展、办实事的心思少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时间少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精力少了。但既然干部是组织安排的,他就应忠诚于岗位、忠实于职责,把心也留在该处,做应做之事,尽应尽之责,建当建之功。留下来,就要引导干部坚定持之以恒的信念,坚持打“持久战”,把“住读”当成一种“习惯”,让“习惯成自然”成为最好的坚持。留下来,就要动员干部放下心中杂念,一心为公、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多思发展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以真情服务履职尽责、取信于民。留下来,就要多组织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抓住重点、攻坚克难点,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一心为民,让干部的心住下来。干群关系如鱼水,群众是水,党员干部是鱼,鱼若离开了水肯定活不成。如果“住读”仅仅是为了搞搞形式、走走过场,对群众的紧迫事、头疼事、烦心事照旧不闻不问、推脱敷衍,那这种“住读”又有何意义?必须让干部的心身一起住下来,才能真正达到密切干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住下来,就要坚持眼往下看、人往下走,往呼声最高的地方走,让群众感到党员干部常在周围,及时找得到、盼时用得上。住下来,就要利用更多的时间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把群众最急、最盼、最怨记在脑海、挂在心头,尽最大努力予以解决。住下来,就要提高干部为民服务的意识,实实在在地了解群众意愿,沉下身子为群众多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全身心地当好为民造福、帮民解难的贴心人。(四川在线 天府评论 朱羽)

习近平讲话 98 次提到“严”字

要求防止四大危险



在 10 月 8 日举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据统计,总书记在讲话中共提到“严”字 98 次。(据 10 月 9 日人民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面对经受“四大考验”、防止“四大危险”的挑战和任务,就要把从严治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98 次提到“严”字,充分表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体现出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信心。

党内生活要从“严”。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运用好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生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等“四大法宝”,把“认真”二字落实到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从严”要求体现在党内生活的各个环节,切实解决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要动真碰硬、触及问题、触动灵魂,敢于揭短亮丑,敢于自我解剖,敢于同错误和消极现象作斗争,真正使严格的党内生活成为加强党性锻炼的“必修课”,成为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金钥匙”,成为促进党的团结、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的重要保障。

制度约束要从“严”。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如果执行制度缺乏刚性约束,

弹性过大,制度就可能成为没有震慑力的“纸老虎”,成为形同虚设的“稻草人”,出现“破窗效应”。正因如此,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出台一系列制度,使党的建设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强化制度执行、增强刚性约束,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肆意规避等行为,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切实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转化为匡正行为的金规铁律,真正形成靠制度管人、按规章办事的好风气,实现作风建设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反腐倡廉要从“严”。十八大以来,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出重拳、亮实招,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案必查。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态度更强、要求更严、力度更大的格局,不管级别有多高,不管资格有多老,只要有腐败行为,党纪国法就不容,表明中央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展示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内没有特殊党员的坚定立场,让广大群众看到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的坚强决心,真正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于民。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各级党组织要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始终绷紧党要管党这根弦,把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体现到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件套”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视为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含义隽永。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包含三大标志性工作,它们都具有类似的原理和效力(公开和制衡),这包括但不限于:

事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约束设租寻租。中国政府为了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拥有大量的决策权、执法权、审批权、处罚权等权力。仅各级政府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就有数千项之多,而且很多权力其实是由地方或部门自行制造,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庞大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对这些权力的监督制约整体偏弱。公共权力面广量大,由于制度变迁、机构改革、人事变动等原因,某些权力有可能被忽略甚至遗忘,而实际由小集体甚至官员个人自行掌握。事实证明,这些处于监督盲区的公共权力,最易沦为腐败“温床”。而借助这些权力寻租和设租历来就是官僚体系权力变现和交易的主要实现形式,与腐败一墙之隔。所以无论是站在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角度上考虑,都应该探索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加大权力公开的力度。

目前正在推行的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推动权力公开运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目前的权力清单主要包含了权力名称、权力依据和行使规则等前端信息,今后还应继续向权力运行的后端延伸,即公开权力过程和权力结果。唯有完整地公开才能使公众不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真正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

还有就是“负面清单”,广义上讲“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领域不开放,明确列出禁止

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各类主体均可自由平等进入。政府管理模式从以前容易滋生寻租设租腐败风险的正面清单(例如几乎全军覆没的国家能源局案例)转向负面清单,这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是从0到1的重大且不可逆的变化。这将从根本上重塑政府的行为,并真正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幅度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实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就根据前面的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全程公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可以确信,这两项关键制度的建立和配套实施,将终结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收权放权”循环怪圈,彻底治理和最终牢牢约束住各级政府闲不住和常常乱摸的有形之手,抑制住权力寻租和审批腐败。同时打破民间资本和政府官员的复杂利益纠葛,治愈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政府的极度依赖)。

事中:公共财政法案实行过程监督。财政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民主是借鉴英国百年“光荣革命”和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传统国家建构完成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都是由财政税收领域起始的,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

如果要约束政府的行为,就从财政预算上约束,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财务一旦公开,权力的运行就暴露在阳光下。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

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不透明的政府,是无法监督的政府,无法监督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现代化的治理就要求逐步将各级政府财政运行从黑箱中逼出来,使其有形之手暴露于阳光之下。

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完善全口径预算(常规预算、国有资本、基金收入、社保基金);除涉密信息外,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范围,到达具体明细科目等细节。还要通过立法要求政府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便于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行为进行动态跟踪。而这也就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财政预算审查职能,将预算支出作为人大批准预算的主要目标,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加强对预算程序的监督,合理、充分行使对预算的修改权和否决权。特别是重大事项要进行听证,重大情况要让老百姓知道,重大问题让老百姓讨论。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这样很多的形象工程,例如豪华的大剧院就不会仅仅凭主要领导的“一支笔”就可以开工,一旦上网公开,相信谁也不敢轻易签这个字。

8月《预算法》修正案已经通过。它显示出了更多的进步主义姿态,具有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的某些雏形和要素。它是约束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更是构建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法律依据。毫不夸张地说,预算法是当下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交汇点,关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运行效率、关涉民生改善、关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梳理。可以预见,包括预算法案在内的系列公共财政法案的修改通过,将昭示着中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大步迈进,它会有效地抛弃GDP锦标赛,使得政府真正看得见,可以监督,可以问责,并转向为服务型、民生型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推进民主理财,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在关键环节上的双重启动。

事后:增量阳光法案进行结果控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拔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

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常识告诉我们,“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反腐不如防腐,而防腐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阳光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有利于利益瓜葛的官员财产公示于众接受监督。既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什么不能公布财产呢?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这个问题是有明显路径依赖的,早解决早受益,设想25年前就执行增量改革,现在的局面就不会如此被动。而且如果这个历史遗留包袱的存量积累越来越大,则越拖越棘手,并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

与其在一步到位的民众愿望和阻力如山的现实中间停滞不前,不如退一步从各方面都能有基本共识的地方做起。与其在过高的标准上难于启步,不如看准大方向后,先开枪再瞄准。与其继续坐而论道,争论不休什么赦免、宽容与和解,不如现在就实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所以现实的态度就是从增量做起,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普遍经验,也就是推行新提拔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原来笔者以为这只是从新任职的处级干部或者新科的公务员开始实行,那么从这些人开始,新的约束条件也就能建立起来,也就意味着20-30年后,当他们成为高级官员甚至决策者时大概率都应该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这点时间对于(下转第20页上接第10页)一个励志伟大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现在看起来实际执行力度会更大,因为它从新提拔(新后备)的干部就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如果现有官员从任何目前官阶往上提拔的话,他都会受到这个阳光法案的约束,例如从正部上升到副国也得满足这样一个约束条件,这会对原来的存量也都一并管理,除非这个官员永远不打算升迁。这就像上海目前试点的房产税一样,名义上是对增量收取,只要你不交易就理论上不会被课税(成本太高),但如果你要进行任何一套的交割,则可以对你名下所有的房产都进行房产税征收,如果不交割则不予交割。一些基层的反馈显示,部分试点地区已经在根据拟提拔的干部的家庭资产情况进行候选人的甄别和筛查了。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放弃了一日建成罗马的目标,改成在若干年内逐步渐进地有序实现。既消



新常态下如何为央行“松绑”

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该是现代央行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越清晰、越单一,则越容易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目前人人都在积极讨论经济的“新常态”,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眼下国内外货币政策均是非常规的:先看国外,美欧日英央行都在实施“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加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组合,传统上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让位于倚重数量的非常规政策;再说国内,中国央行开始将“定向宽松”(Targeted Easing)作为货币政策的关键词,将货币政策风格由“大水漫灌”转变为“滴灌”与“喷灌”。今年以来两度的定向降准,以及再贷款工具的“老树新花”,加上热议中的抵押补充贷款(PSL),似乎都构成了定向宽松的新工具组合。

中国央行政策重点转向定向宽松,实际上是应对两难境地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一方面,今年初以来,宏观经济数据的下滑使得保增长压力加大,通过放松政策来确保GDP增速不低于下限,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硬性承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杠杆率高居不下,尤其企业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在存量

与增速方面令人担忧,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以及中西部新增基础设施的低利用率,都意味着宏观政策调控不能再走总量宽松的老路。换言之,中国央行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痛苦权衡的结果,正是出台定向宽松政策的原因。

做央行官员不易,做中国央行官员尤其不易。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仅是维持低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不过是兼顾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实施定向宽松政策之前,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就已经包含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平衡,而从定向宽松开始,似乎调结构也成为了中国央行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如此多的政策目标,彼此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确保实现上述目标吗?定向宽松是否会成为货币政策的难以承受之重呢?

笔者认为,中国央行的定向宽松政策,虽然确实是货币政策创新之举,但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却又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以下五点因素。

首先,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总量政策,用货币政策来调结构可谓工具错配。一般而言,货币政策

解了既得利益,又避免了疾风暴雨,做到了润物无声。一旦成行,就会形成结果控制(刑法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会成为对腐败的最大制约。它同时也是无声处的惊雷,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考虑到18大以来惩治腐败的速率和持续性,这个法案净化官僚体系的速度一定比期望中要快得多。(财新网 邵宇: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暨研

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任职上海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系主任,CFA项目主任。2011年加盟东方证券研究所,目前任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代表作品包括《穿越镀金时代》、《危机三部曲》、《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金融创新与体系设计》、《证券投资分析:来自报表和市场的见解》等。)

调节的是经济体或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松紧(无论是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这样的数量手段还是通过短期政策性利率变动这样的价格手段),但它并不能保证流动性的最终流向。能够真正调节流动性流向的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例如,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能够降低最终流入资产市场的流动性规模。但是,宏观审慎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属于不同的范畴。

其次,要让货币政策发挥调结构的功能,即使采用最为透明化与市场化的机制,也必须赋予央行对借款者或中介结构提供差别化待遇的权力。例如,如果是定向降准,那么究竟对哪些部门的哪些机构降准?如果是再贷款,那么究竟对哪些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从之前的定向宽松实践来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倾斜的重点包括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与棚户区改造贷款。政策照顾的重点似乎并没有错,但究竟给哪些金融机构贷款,贷款多少更为适宜,依然是需要央行相机抉择的事情。这样的工作是由央行来做?还是由中国财政部来做?还是由中国国务院来做?既然定向宽松赋予了央行新的权力,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督并评价央行量化宽松的绩效?定向宽松政策是一种新环境的产业政策吗?针对金融机构的相机抉择是否会创造新的设租与寻租空间?……这些问题目前似乎都还没有答案。

再次,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该是现代央行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指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发生分歧时,应该允许央行克服其他部门的阻力,重点关注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越清晰、越单一,就越容易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而目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目标越来越多的现实,似乎并不利于提高其独立性。例如,如果央行的定向宽松政策具备了产业政策特征,那么央行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与纠葛,其实正在不断加深,要快刀斩乱麻将变得更为困难。

第四,定向宽松政策的实施并不利于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央行正在实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由M2

(广义货币供应量)向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转型。近年来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已经使得传统的银行贷款、M2等指标变得越来越不准确,要全面把握市场整体流动性的变动,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等似乎是更好的指标。然而,定向宽松政策工具关注的中间目标依然是数量,而非是价格。因此对定向宽松的过度关注,可能会妨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转变。

第五,应该将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与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区分开来。目前对于PSL的界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将成为补充外汇占款的新的基础货币发行工具,有人认为它是央行干预中期利率走向的政策工具,有人认为它无非是新版本的再贷款工具。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逐渐消失,中国央行的确应该找到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而最适宜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仍然是在公开市场上的国债买卖。因此,央行与财政部应该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财政部应该发行更大规模、更多期限的国债产品,这除了能够提供更多资金来源之外,还有助于为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充足标的。毕竟,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应该是仅考虑总量而不用考虑结构的,这与PSL属性似乎恰好相反。

综上所述,中国央行的未来政策重点应该是在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背景下,进而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由以数量为主到以价格为主的转型。同时在外币资金流入规模下降背景下,找到新的可靠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而非通过定向宽松政策来实现调结构的任务。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应该过分倚重货币政策这样的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才是更理想的调结构工具。过去几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从某种角度来讲有些缺位(例如死守2-3%的财政赤字底线,在发行国债方面过于保守等),这才导致货币政策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任务与压力,以至于成为中国央行的难以承受之重。在未来,中国财政部与发改委等其他部门应该在调结构方面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才能为中国央行松绑,提高后者的独立性,让央行的政策重心回归到维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上来。(英国《金融时报》张明)

中国关押贪官的“豪华监狱”人满为患



核心提示：在习近平“打虎拍蝇”政策下，导致关押高级官员的“豪华监狱”人满为患。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9月3日报道称，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在世界闻名。在习近平“打虎拍蝇”政策指导下，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一同成为反腐的目标。中共高级成员的落网显然导致一直专门关押高级官员的“豪华监狱”目前人满为患。

报道称，自习近平在2012年掌握中共控制权以来，已有将近40名副部级和以上级别的官员受到调查。然而，这些高级官员并不会和普通罪犯一样被简单地投入监狱。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关在所谓的“豪华监狱”里——而这些豪华的牢房正在被迅速地填满。

最著名的此类监狱就是北京昌平区的秦城监狱。与其他监狱不同，秦城监狱并不属于中国的司法系统，而是在公安部的直接掌控之下。这座监狱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历史上一直是关押中国高级官员的主要监狱，其中包括为文革负有责任的“四人帮”。

报道称，如今，秦城监狱的在押者包括中国落

马政客当中的各位名人：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以及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还不包括在习近平任期内受到调查的官员。一旦双规或党内调查结束，这些官员的案件将被移交给公安机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被转移到秦城监狱。被判刑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度过余生。

秦城监狱尽管设施完善，但秦城监狱的在押者不会忘记他们事实上是在监狱里。据昔日在押者介绍，所有在押者都受到全天候的监控。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因为担心在押的官员可能会自杀——一些报道称，这里的牢房经过特殊的防自杀设计。

报道称，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级官员即便是在监狱里也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不过现在，由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拘押的官员大量涌入，秦城监狱似乎就要没有牢房了。这座监狱已经在尽力增加豪华牢房的数量；据报道，秦城监狱在2012年进行了扩建，恰恰就是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正式启动之前。与此同时，政府还在河北省新建了另一座“豪华监狱”，叫做燕城监狱。

报道称，尽管秦城监狱进行了扩建，而且新建了燕城监狱，但据报道秦城监狱即将满员。燕城监狱在建时，许多人推测这座监狱可能会完全取代秦城监狱，但现在看来，这两座监狱加在一起也应付不了被定罪官员的大幅增加。

秦城监狱在上世纪60年代也进行过重大的扩建和改造，当时文革期间被判入狱的大量“反革命”超出了秦城监狱的接收能力。中国的国家媒体经常强调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有多大——中国的“豪华监狱”没有地方就是这一成就的副产品。（参考消息网 编译/沈丹琳）



大数据的十大发展方向

1、大数据分析领域快速发展

大数据无疑是目前 IT 领域的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几乎凡事都要挂上点大数据,否则就显得你 OUT 了。相信大多数人都能顺口说出大数据的四个特点:容量大,多样化,速度快以及高价值。但随着人们对于大数据的逐渐了解,人们开始讨论大数据究竟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大数据的未来服务方向在哪里?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下未来大数据的十大发展方向:

方向一:大数据分析领域快速发展

数据蕴藏价值,但是数据的价值需要用 IT 技术去发现、去探索,数据的积累并不能够代表其价值的多少。而如何发现数据中的价值已经成为企业用户密切关注的话题,于是大数据分析领域成为了人们密切关注的问,毕竟,这个直接关系到数据的利用情况。随着大数据行业 IT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数据分析技术将迎来快速发展,不同的挖掘技术,挖掘方法将是人们未来比较重视的领域,毕竟,这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数据价值的最终体现方式。

方向二:分布式存储有了用武之地

大数据的特点就是数量量多且大,这就使得存储的管理面临着挑战,这个问题就需要新的技术来解决,分布式存储技术将作为未来解决大数据存储的重要技术。分布式存储系统将数据分散存储在多台独立的设备上。这就解决了传统存储方式的存储性能瓶颈问题。分布式网络存储系统采用可扩展的系统结构,利用多台存储服务器分担存储负荷,利

用位置服务器定位存储信息,它不但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存取效率,还易于扩展。

2、大数据与云技术的结合

方向三:大数据与云技术的结合

如果再找一个可以跟大数据并驾齐驱的 IT 热词,云计算无疑是跟大数据关系非常大的一个词语。很多人在提到大数据的时候总会想到云计算,二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句话来解释二者:云计算是硬件资源的虚拟化,大数据则是海量数据的高效处理。

3、大数据与云技术的结合

虽然大数据与云计算并不是一个东西,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目前,很多人认为,云计算将是未来解决大数据的最佳平台。云计算相当于我们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将大量的硬件资源虚拟化之后再行分配使用,大数据则是我们处理的数据。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处理器的最佳平台,未来,这种趋势的发展将越来越让二者的关系更紧密。

方向四:隐私问题让大数据受影响

数据价值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样也有阻碍着大数据发展的一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隐私问题无疑是困扰大数据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一些我们之前看似并不重要的数据信息,在大数据中心,许多这样的信息就很可能轻松了解一个人的近期情况,从而造成了个人隐私问题。而且如今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个人隐私越来越

难以保护。有可能出现利用数据犯罪的情况,当然关于大数据隐私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对,还需要有专门的法规来为大数据的发展扫除障碍。

4、大数据推动向 Scale-out 发展

方向五:大数据推动基础架构向 Scale-out 发展

基础架构是大数据首先面临的挑战,如何让基础架构能够存取更多的数据呢?传统的基础架构能否满足用户需求呢?目前,来说,虽然基础架构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当他的挑战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大数据行业的发展,而且这种数据的增长将呈现爆炸式增长,就对传统的架构形成了迎新春。随着大数据量的逐渐增大,可以通过分布式的处理方式把应用复杂分散到分布式系统的各个节点上,而传统的数据处理将是运算能力非常强、CPU 主频非常高的一台机器来处理,而不是大数据这种多个节点、多个 CPU 核数来处理,这代表了大数据时代发展方向从 Scale-up 转向 Scale-out。

方向六:数据共享联盟的成立

对于大数据来说,未来,将可能将不同的行业更加细分,针对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分析技术。但是同样对于大数据来说,数据的多少虽然并不意味着价值更高,但是更多的数据无疑更有助于一个行业的分析价值的发现。例如,对于医疗行业,如果每一个医院对自己的数据进行分析,相信也能够获得相应的价值,但是如果获得更多的更大的价值,那么就需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医疗信息共享,这样才能够通过平台进行分析,获取更大的价值,所以为了,数据可能会呈现一种共享的趋势,数据联盟可能出现。

5、大数据安全越来越受重视

方向七:大数据安全越来越受重视

随着数据的价值的越来越重要,大数据的安全稳定也将会逐渐被重视,大数据不断增长,无论对数据存储的物理安全还是对数据的管理方式都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对数据的多副本与容灾机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6、大数据安全

2013 年,网络和数字化生活也使得犯罪的分子更容易获取关于他人的信息,也有更多的骗术和犯罪手段出现,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无论对于数据本身的保护,还是对于由数据而演变的一些信息的安全,都将至关重要。

方向八:大数据将催生一些新的行业

一个新行业的出现,必将在工作职位方面有新的需求,大数据的出现也将推出一批新的就业岗位,例如,大数据分析师,数据管理专家等等。具有丰富经验的数据分析人才将成为稀缺的资源,数据驱动型工作将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7、中国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

方向九:大数据将成为企业 IT 核心

随着大数据价值逐渐被发展,大数据将成为企业 IT 的核心,毕竟在这个以盈利为主导的行业环境中,谁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将会更重要。在以往,IT 系统更多的在企业中是扮演辅助工作的任务,而随着大数据的发展,IT 系统也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如今,社会化数据分析也正在崛起,这对于 IT 和非 IT 来说都影响深远。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开始分析舆情、地理位置、行为、社交图景和富媒体社会化数据来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进行更有效的风险管理,IT 部门也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应用协作解决问题,或者定义需求。

方向十:中国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

中国在未来将可能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同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快速的上升期。中国产生的数据将是巨大的,而巨大的数据对大数据的发展将起到促进的作用,而大数据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也将领先。

全文总结:大数据将给中国的市场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机会,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市场是非常有前景的,是值得大家重视的一个市场。各行业的客户和各行业的开发商也应该在大数据市场抓住机会,借助自己的优势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借助大数据走的更远。

(2014 年第 10 期《决策与信息》王迪)



林彪的“怪异”

在战争年代，林彪出生入死，不畏艰苦，充分彰显他超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自解放后，他好象换了一个人。

他曾经拒绝毛泽东主席点他的将，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同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表现出对美军的无限恐惧。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同志说过：过去林彪在战场上是不怕死的，这次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什么他会如此懦弱？表现出对林彪的不理解。

毛泽东主席让林彪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林彪长期担任东北野战军（后来的第四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在严寒山区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朝鲜虽多山，但她的地理位置和作战条件和我国的东北山区相似，林彪是指挥志愿军作战的最佳统帅人选，没想到他会自称身体有病，拒绝入朝作战。这令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十分尴尬。

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林彪就在原中共中央东南局（广州）开始过起了深居浅出养尊处优的疗养生活，“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经济，不关心战争”。每到一地，他都吩咐随行的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居室门窗用布帘挡上（只有阴天或多云天气打开窗帘），室内只点不超60瓦功率的灯泡用于照明。他从不相信天气预报员的天气预报，而是每天自己趁

太阳光不足时走出室外，仰望天空，是否有雨。亲自动手，在窗户上抠个洞，粘上纸条，看着纸条摆动的幅度，来测试风力的大小。林彪不喜欢水，他所疗养的地方，不能有游泳池之类的设施，甚至自来水和便桶的冲水声，他都反感。特别是当倾盆大雨来临时，他会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将门窗紧紧遮挡，以防雨声传入卧室。此时的林彪，怕光（强烈的太阳光）怕风怕水，仿佛真的过起了“于世隔绝”的生活。

林彪不尽女色，男女私生活堪称作风正派。膳食以素为主，几乎荤腥不动，常用零食炒黄豆或淡盐水煮黄豆，喜欢趁热吃水煮的不放盐和任何佐料的白菜，烫嘴才好。林彪从不用水沐浴，就连洗脸也一样，喜欢用干净整洁柔软的干毛巾擦拭皮肤。

林彪的这些“怪异”生活习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高度物质享受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疯子”。实则不然，笔者以为，这正是作为一支军队统帅的林彪，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养成的习惯的一种延续。他作为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凭肉眼，就可观测天文，勘察地貌；遮挡窗帘用暗淡灯光完全是为了指挥安全的需要；在高度集中思考策划每一次重大作战行动情况下，一滴水的声音也会扰乱思绪……

揭秘林彪的婚姻与爱情

◇汪二小姐苦等40年

林彪的是非功过，历史早已作了公正的结论。作为我军历史上的十大元帅之一，林彪的军事才能和对中国革命的不容抹杀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毛主席在“九一三事件”后指出，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林彪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当时被认为是“阴影笼罩下的正面人物”。最近几年来，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种，林彪出现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比如在电视连续剧《井冈山》中，对林彪作了客观的塑造。特别是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身着元帅服的林彪蜡像出现在军事博物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历史的公正和社会的进步。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林彪的了解，更多的是他的军事，对他的婚姻和爱情，知道的并不多。其实，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林彪的感情世界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他的婚姻和爱情也是曲折而坎坷的……

◇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

林彪于1907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林家大湾村。8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林彪找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姑娘做童养媳，这个姑娘是本镇汪家的二小姐。可那时的林彪还是个娃娃，对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参加革命以后，就把这件事忘了，好几年都没有回林家大湾几次。

1927年春节前夕，林彪随北伐军进驻武汉，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他病入膏肓，让林彪火速回家。林彪是个孝子，接到父亲的信后，他潸然泪下，当即请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亲骗他回来成婚的。林彪虽然十分恼火，但在父母的苦

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经等了他十几年的汪家姑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当晚，汪家姑娘进入了梦乡，林彪却睡意全无。这样的婚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看了一眼熟睡中的汪氏，悄悄地走出房门，向父母的房间深深拜了一拜，就连夜离开了林家大湾，返回部队去了。

到了部队后，林彪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信，让汪氏不要再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找一个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气得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几天，然后当众发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岁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任凭父母和亲友怎样劝说，她对别人的提亲一概拒绝，终身未嫁，始终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全国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痴情的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执意搬回了娘家，独守空房，以做鞋维持寂寞的生活。

也许人们认为，此时的林彪权位高，何况过了几十年，应该把汪氏忘得一干二净了。其实不然，林彪一直没有忘记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要回家乡看看。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他心里有一种浓浓的思乡之情。

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书记问起了汪氏：“她现在到了哪里？生活得还可以吗？”

公社书记说：“汪奶奶已经56岁了，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她家里已没什么人了，现在她自己靠做鞋为生，生活一般。”

林彪听了，心头一震，但他没动声色。他让秘书拿出3000元钱，让公社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如果她问谁给的钱，就说是党给的吧。”

林彪走后，公社书记将 3000 元钱交到汪氏的手上，说：“汪奶奶，这是政府给你的生活补助费。”

汪氏大吃了一惊，因为那 3000 块钱相当于她 10 多年卖鞋的收入。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可又不敢相信，难道他真的回来了？她问书记：“这钱到底是誰给的？”

书记哄她说：“汪奶奶，别犯猜疑了，这钱的确是政府给你的。”

汪氏固执地摇摇头：“你若不说实话，这钱我就不收。”

有林彪的嘱咐，公社书记哪敢说实话？最后，他让汪氏对天发誓，如果她能保守秘密，他就把钱来告诉她。汪氏说：“要是乱讲，遭天打雷轰！”

于是，书记才悄悄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

汪氏听了书记的话，昏花的老眼里顿时滚出了泪珠，嘴里喃喃地说：“真是吗？真是他，他还没忘了我？”

从此，汪氏把钱锁进箱底，依然靠做鞋为生。不过，她的鞋再也不用发愁卖不出去了，因为供销社奉命每 10 天上门收购一次，有多少要多少，而且价格比市场上的高一倍。

不久，汪氏还获得了政府发的一个“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生活补助。

当然，这些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 年，汪氏因病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寂寞而凄凉的一生。在清理汪氏的遗物时，发现那 3000 元钱依然在箱底放着，而且包得严严实实。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这就是林彪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林彪真正的感情经历是在革命军队中开始的。

◇ 第二位妻子是“陕北一枝花”

1936 年，毛泽东决定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他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红大”是“抗大”的前身。这一年，林彪 28 岁。

那时，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全国众多的优秀青年。延安处在一种相对平和环境里，青年们就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并邀请中央领导参加。每逢星期六，延安枣园里就要举行舞会，中央领导在闲之余常去跳舞。

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是那种浪漫型的人，所以他从不上场跳舞。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姑娘对林彪倾慕不已。因为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具有“常胜将军”美誉的林彪，成为众多姑娘梦中的“周郎”。

面对这些姑娘的青睐，正值青春年华的林彪并没有无动于衷，他没有选择那些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来的姑娘，而是把爱情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张梅。

张梅的真名叫刘新民，在米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人称“陕北一枝花”。然而，真正打动林彪的并不是张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面对林彪的追求，张梅心里自然高兴。她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对林彪十分仰慕。虽然林彪不擅长在姑娘面前献殷勤，但崇拜英雄的她，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份感情。1937 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张梅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

1938 年 3 月 2 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这一枪对林彪的身体损伤很大，尤其是日后给他带来了很多后遗症。

受伤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疗，但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太好。这年冬天，经党中央批准，林彪由张梅陪同，远赴苏联养伤。这一去，林彪在苏联待了 3 年。

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征战多年，看惯了刀光剑影，现在终于暂时过上安宁的生活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除了研究军事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林彪却不准她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天生要强的张梅哪里能受得了这个？林彪越是不让她外出，她就越要出去，甚至在星期天也不和林彪在一起，两人越闹越僵了。

1942 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张梅却留在了莫斯科，两人的婚姻就此结束。

◇ 一生最爱孙维世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起来。1937 年底，周恩来派人将孙维世从武汉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孙维世先后就读于抗大、中央党校和马列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1938 年，孙维世年仅 18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维世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富有教养，深得大家喜爱，不知倾倒了多少小伙子。当时，林彪是抗大的校长，虽然孙维世如此出众，但林彪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因为他那时刚与张梅结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



孙维世(中)

平时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孙维世同机前往,去苏联学艺术。在苏联,孙维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

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这伙年青人十分活跃,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在一起玩耍,举行各种讨论会和文艺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养伤,就常常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林彪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可林彪不是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肯多讲自己。他的谦逊,更引起了这群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当时正和张梅闹矛盾,心情十分沉闷,这群青少年的活泼和天真深深感染了他,使他苦闷的生活得到了一丝慰藉。

本来,林彪不是那种见了漂亮姑娘就动心的人,但不知不觉中,一个姑娘闯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一颗爱慕的种子在他心底悄然萌动了,这个姑娘就是孙维世。

以后,只要这群青少年请他去参加活动,只要孙维世在,他都会爽快地答应。每次活动,林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孙维世,问这问那,十分愿意跟她说话。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只能暂时把感情埋藏在心底。

感情这东西,一旦萌生,就很难抑制。林彪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向孙维世发起了爱情攻势。一段时间以后,他终于向孙维世公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却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孙维世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仍然关心着孙

维世,因为他确实很爱对方。

1942年,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还是失败了,孙维世仍然回绝了他。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在林彪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痛,也成为孙维世日后悲剧的根源。

林彪回到延安的第二年,就与叶群结了婚。后来,叶群知道了林彪追求孙维世的事,认为是自己的耻辱,就把心中的不满迁怒到孙维世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成为戏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但文革爆发后,她就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罪名投入监狱,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

◇ 与叶群结为终身夫妻

叶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叶宜敬。她的父亲叶琦是国民党的少将,有3房老婆,叶群是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爱女。

叶宜敬从小聪明伶俐,爱出风头。她小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一年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了广播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叶宜敬到了延安,改名为叶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学里工作,任教务处下面的组教科科长。

叶群个头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在延安算得上个美人。正值妙龄年华,她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发愁。对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作自己的终身伴侣,叶群简直伤透了脑筋。她的目标是在找一个当领导的,职位越高越好。但是,她把中央领导挨个过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使她越发苦恼。

正在这时候,从苏联养伤的林彪回到了延安。叶群了解到林彪年龄仅仅比自己大十几岁,又了解到林彪已经有了妻子和女儿,但她却动了心思,要用自己的魅力征服林彪。

林彪回延安不久,就听说了叶群的来历。有一天,他到女子大学,正好校长、副校长和教务处长都不在,教务处里只有一个妙龄女郎正在翻阅杂志,这位妙龄女郎正是叶群。一阵闲聊之后,叶群和林彪认识了。叶群的热情洋溢和落落大方,给林彪留下和很好的印象。

1943年,林彪和叶群正式结婚。第二年,叶群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豆豆。1945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林立果。

从此,林彪和叶群结成了终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中华网论坛 朱 华)

古代对官员的“民主评议”

如今，民主评议干部早已不鲜见。在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民意成分，是各地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其实，在我国古代也有官员民主评议，而且有的朝代搞得还相当红火。

春秋时期，郑国办了许多“乡校”，也就是乡村小学。后来，村里人经常聚在“乡校”里谈论家长里短、国家大事，甚至评论时政得失。一些官员听到乡校里的非议之声很不自在，就建议郑国卿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意思是：他们说的我做得对的地方，我就照着实行，他们说的我做错的地方，我就改正，这乡校就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取缔它呢？让民众自由评判官员，把民众的意见当成施政的镜鉴，子产拉开了中国古代“民主评议”的序幕。

民主评议的真正开端，是汉魏时期的“乡议选士”制度。当时，官员的选拔、考核都要举行群众评议。西汉时，国家定期派遣官员到各地巡行。每到一地，他们先进行调查问卷，听取群众对各级官员的评价，然后调阅档案资料、听取汇报，最后对官员做出评价。由于群众声望很高，农民朱邑可以从乡官一直升到大司农。相反，民主评议不佳的人，也会遭到拖累。汉代的栎阳县令谢游，由于在民间口碑不佳，被上级勒令辞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议”之风兴起。即使你是乡野村夫，如果受到“清议”表扬，那你去朝廷当官的可能性极大；相反，为官者一旦被“清议”批判，十有八九会丢官罢职。

到了唐宋时期，民主评议有了进一步发展。唐朝在考察地方吏治时，把民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唐宣宗时，醴泉县令李君爽任期满，数十父老代表民众向上级州府具状要求他留任，又一同去庙里设斋求佛，恰巧皇帝微服打猎时知道了此事。此后不久，皇帝亲笔御批：醴泉县令李君爽可为怀州刺史。北宋的刘随任永康军判官时，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当地人尊其为“刘父”。后来，刘随遭人陷害被罢官。当本路监司到永康视察时，许多百姓拦马大喊“还我刘父”。监司把情况上报朝廷，刘随最终得以申冤，并官复原职。到了明清时期，官员民主评议蔚然成风。朱元璋在《大诰》中明确提出，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地方官吏进行评议，其意见可直达中央。明代的海瑞刚正不阿，被百姓誉为“海青天”。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家家户户在门前供桌上摆放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以颂扬他“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退休后的海瑞经常外出视察民情，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地方官都敬他三分。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的束缚，民主评议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并不是真正为百姓服务，因此古代的民主评议虽然如火如荼，但难以持续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缺乏固定的制度体系约束，民主评议具有较大随意性、主观性，也出现了一些投机取巧、假借民意的现象。如，明宣宗时永宁县税课大使刘迪就曾经常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表扬信，以谋求留任。

民主评议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得真正的民意，将百姓的意见传递到决策层。只有这样，真正优秀的干部才能脱颖而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刘炯 《文史博览》）